

当代杂文选粹

第二辑 严秀 牧惠 主编

邓
拓

之
卷



第二辑

邓拓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秀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二辑）

邓拓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63000

印数，1——10030

ISBN7—5404—0184—2/I·131

统一书号：10456·317 定价：0.87元

出版者前言

本社编辑部编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废弃“庸人政治”	1
生命的三分之一	4
欢迎“杂家”	7
贾岛的创作态度	10
三分诗七分读	13
少少许胜多多许	16
不要秘诀的秘诀	19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23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26
堵塞不如开导	29
一个鸡蛋的家当	32
两座庙的兴废	35
最现代的思想	38
“批判”正解	41
事事关心	45
创作新词牌	48
艺术的魅力	51
八股余孽	55

不要空喊读书	58
“放下即实地”	61
王道和霸道	64
智谋是可靠的吗?	68
围田的教训	72
文章长短不拘	76
奉告读者	80
学问不可穿凿	83
说大话的故事	87
两则外国寓言	90
古迹要鉴别	93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	97
“伟大的空话”	100
专治“健忘症”	103
是简化字还是错别字呢	106
上山、下乡、下水	109
郑板桥和“板桥体”	113
编者后记	122

废弃“庸人政治”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

象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查看一下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何尝不是大可不必做的哩！就说人事工作吧，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大可不必做的。

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了另外的许多人来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转报告，等等。结果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使这么一大批干部全都陷在日常

“公事”中不得解脱。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说我们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

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又有一些同志光在空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显得一天天更加忙起来了，又在加紧开会、谈话、写报告，等等，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同志实际上可以说还不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工作，什么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该让这些同志冷静一下，先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庸人。而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

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乎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象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滥作主张为好。

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决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那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报》）

生命的三分之一〔注〕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

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

勤奋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注〕 本书自《生命的三分之一》以下至《古迹要鉴别》等23篇文章，均取自作者的《燕山夜话》合集（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用马南邨的笔名发表于1961.1962两年的《北京晚报》。合集本（共五集）缺具体发表日期，本书按合集本次序编排。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全书，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贾岛的创作态度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据《旧唐书》、《全唐诗话》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墓志铭等的记载，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县。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英雄豪侠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剑客》的五言绝句中写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